

转型社会的 私营企业主

社会来源及企业发展研究

李路路 /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型社会中的私营企业主：社会来源及企业发展研究/李路路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12

ISBN 7-300-02418-1/F·728

I. 转…

II. 李…

III. 私营企业-阶层-研究-中国

IV. D66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3533 号

转型社会中的私营企业主

——社会来源及企业发展研究

李路路 著

出版 发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157 号 邮码 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丰台区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625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87 000

定价：15.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自中国社会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变迁的最集中体现之一，即是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重新出现和发展。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随改革而新生的结构成分，虽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社会结构自改革以来所发生的所有变化，但他（它）们在当代中国长期销声匿迹之后的重新出现和飞速发展，至少是透视社会结构变革的一个极好视角。私营企业主是由什么样的人构成的？他们从何而来？什么样的因素在私营企业的发展或成功中具有重要作用？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解释，将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和机制。

国内外学者围绕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所发表的大量著述，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背景和分析性框架。中国社会和中国改革的特点决定了它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不同于其他国家或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是唯一真正处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社会。认识和分析这一过渡时期和过渡社会的特点与机制，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对私营企业主的研究给作者的启示是，我们有必要根据中国所发生的实际变化，重新审视一般的理论框架和变革的机制。作者只是从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角度描述所发生的变革，没能对此给予更深刻的解释。

本书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作者参与的两次全国性私营企业主问卷调查的资料。由于自身的能力和兴趣所限，对两次调查所提供

的丰富资料仅使用了其中一部分。

作为一个经验性研究，本书将努力对经验性调查的结果作出分析性的解释。对于私营经济的发展过程和现状做总体性的描述和讨论，已经有了许多著述，我们在这里不应再做重复性的工作^①。在本书中，私营企业主基本上是被作为一个还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社会群体，分析的重点是探讨他们产生和发展的内在特点，以及各种不同因素对这一过程的影响，即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

本书将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在第一章中，首先简要阐述了研究的基本背景和理论前提，主要是市场转型理论及其围绕市场转型理论所发生的讨论。还简要阐述了研究的基本思路，并且根据研究结果，概括了其中最基本的结论。从第二章开始，试图根据实证调查，较为详细地讨论在第一章中所提出的最基本结论。第二章分析了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结论是，在进入私营经济部门的阶段，那些在原来的再分配经济中占有优势地位的人，例如干部，也将占有一定的优势。从这个方面看，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再分配经济的社会结构具有明显的再生产自身的能力，而这种结果主要是由于渐进式改革的推动机制所造成的。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主要分析了对私营企业成功具有重要意义的变量，为了分析的方便和可能，我们将所认识和所收集到的有可能影响私营企业成功的变量分为三个模型，即宏观环境模型、企业经营模型和个人因素模型，然后逐一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基本的结论是：再分配经济的因素不再占有明显或直接的优势，市场化的因素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由于分析能力和分析工具的限制，没有将所有三个模型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这应该也属于本研究的缺憾之一。在本书的附录中，我们将把提供本书数据的 1995 年调查

^① 可参看张厚义、晓亮、贾铤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著述。

使用的问卷附上，以有助于了解这次调查和在本书中出现的数据。

作者

III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社会的市场转型和私营企业主.....	1
一、提供发展机遇的经济空间和体制空间.....	3
二、私营企业主群体的结构性要素.....	9
三、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意义——两种基本分析模式	14
四、“混合经济”下的多重推动机制.....	23
五、研究说明	38
第二章 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特征	42
一、社会来源特征的区分	42
二、“结构性障碍”和“结构性优势”	50
三、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	60
四、进入私营经济部门的经济资本	73
五、私营企业主的地域来源	77
六、与其他类型企业家的比较	80
七、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模式	97
第三章 市场化：企业发展的环境和经营模型.....	102
一、企业发展或“成功”的涵义.....	102
二、宏观环境因素与企业发展.....	111
（一）制度因素与企业“位置”的影响.....	111
（二）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18
（三）有控制的宏观环境模式.....	135

三、企业经营与企业发展·····	136
(一) 企业经营的各种特征·····	137
(二) 迈向更高层次的市场化·····	140
(三) 有控制的企业经营模型·····	153
第四章 “多元混合”：私营企业发展的个人模型·····	156
一、私营企业主个人背景与社会“关系”特征·····	157
二、从再分配权力向“多元混合”的转化·····	168
三、有控制的私营企业主个人模型·····	196
第五章 “殊途同归”：不同背景私营企业主比较·····	199
一、不同的个人特征·····	199
二、不同的经营特征·····	202
三、群体意识与社会态度·····	211
四、“条条道路通罗马”·····	217
附录：调查问卷·····	220
参考文献·····	230

第一章 中国社会的市场转型 和私营企业主

在经历了长期的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之后，中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起，开始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巨大的幅员、悠久的历史、特定的社会结构体系和独特的改革之路，使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呈现出自己的特殊性，或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更为广阔的历史眼光看，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变迁过程。经济体制的转型，同时也是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从社会学的研究角度出发，我们关注的是这种经济体制转型对人们的社会地位及其获得、对不同社会群体及其相互关系乃至对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影响。同时，我们有兴趣通过这些变迁的结果，去探讨这种结构变迁过程的机制，或者说，影响这种变迁过程的主要因素，从一个侧面来解释或预测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社会变迁。作为一个社会体系，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制度在本质上相互结合在一起，不同的社会、在不同的时期，各种因素结合的方式、具体内容和变化过程等方面，都会表现出很大差别。对社会变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认识和解释这些差别，认识和解释不同社会变迁的特点。

本书是一个经验性研究的结果。许多人对中国已经发生的和

将要发生的社会结构变革，从多种角度进行了讨论。^①中国正在迅速朝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社会结构日益分化的方向发展，这已成为确定无疑的客观发展趋势。我们在这里选择了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作为讨论中国社会结构变革的对象，这就是十几年来迅速发展的私营企业主群体。在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中央集权经济体制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特别是中央政府将几乎全部社会资源或社会剩余集中在自己手中，私营经济部门，包括私营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和现实性。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随着中国社会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私营企业以及私营企业主是在这一体制改革过程重新再生的社会成分和社会群体。从改革初期的个体户开始，1988年宪法修正案正式确认了私营企业在法律上的合法地位，私营企业在中国伴随着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迅速成长起来。自1989年单独对私营经济进行统计以来，私营企业以平均每年32.6%的速度发展，至1995年底，全国私营企业已达654 531户，从业人员956万人，产值2 295.2亿元，在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占5.1%。^②在全国很多地方，个体、私营经济的产值已占当地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或一半以上。值得人们更加重视的是，除了特殊时期或特殊情况之外，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没有丝毫减缓的趋势，甚至国家宏观经济环境的调整都似乎没有影响它们的迅速增长。

在这种背景下，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仅是中国原有经济体制发生变化的标志，而且更是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和正在发生重大转型的基本标志。从一个不仅不允许私有财产存在、而且个人的自私观念都会受到批判的社会，逐渐过

① 可参看郑杭生等、陆学艺等、孙立平等、李培林以及其他研究者和作者本人的著述。

② 参看《工商行政管理统计汇编（1995）》，北京，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办公室；《中国统计年鉴（199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渡到私营经济不仅合法存在，而且在各种经济成分中成为发展速度最快的一种经济成分，这本身难道不是巨大的社会结构变迁吗！

私营企业主群体地位及其发展的特殊性，提供了一个研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与机制的适当对象和观察角度。在我们看来，这种探讨或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描述一个新的社会群体的即存状况，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私营企业在中国出现和发展的特殊性，人们有可能通过研究私营企业主的特点、流动渠道和方式、地位获得机制及其机会结构等，去透视社会结构变迁的机制，认识社会结构变迁的道路，而这种机制和道路的特点经常没有得到清晰阐述，或者至少对中国社会来说是如此。我们希望这本书对私营企业及其私营企业主的分析能够提供这种可能性。因此，我们的基本问题是：私营企业主是由一些什么样的人构成的；他们从何而来；他们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什么样的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决定或影响了这些人走上私营企业经营的道路；什么样的因素对私营企业的成功有重要影响。

在本章中我们首先讨论这一研究的基本背景和理论模式。

一、提供发展机遇的经济空间和体制空间

构成研究背景的首先是私营经济领域重新开始发展的历史特征。

中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社会转型，包含了两个基本的变革，即：由初级工业化向成熟工业化的转变，以及由传统的中央集权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尽管体制转型是最初的动因，然而，两个过程从一开始就并行发展。探讨中国新的私营企业主群体的出现和发展，应该从这样两个基本维度出发。

毫无疑问，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但是，真正的工业化进程，即各种社会资源，包括

人力资源等在全社会范围内集中于国家的工业化目标，整个社会被动员起来加入到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并在全中国范围内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则是 1949 年发生根本性社会制度以及社会结构变革之后。从那时起，整个国家的工业化以极高速度发展，应该说，至本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初步的工业化，并初步建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工业化仅仅是一个社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初级阶段。对于中国来说，主要是因为下列因素决定了工业化在中国还远未完成：第一，从整个社会来讲，整个社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一系列经济指标都远远低于一般的工业化国家，更不用说高度工业化国家了。第二，尽管初步建立了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但这里所谓“完整”，仅仅是指在强制性压低需求、严格按照中央计划体制分配社会资源的情况下，在较低程度上维持经济体系、或工业体系较低自我循环需求的完整。在国家超速发展、突出重点的工业化目标指导下，若干产业突进发展，而其他产业则相对或绝对滞后。这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与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产业以及第三产业、农业等发展滞后；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规模的扩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发展，原有的工业化水平和产业结构实际上早就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中国的经济结构现状以及面对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即使与相同经济发展水平和类似经济发展环境的国家相比，也表现出显著的不合理性。第三，工业化体系在地区布局上畸轻畸重。出于军事、政治、地区平衡等多方面的考虑，中国的工业化重点或重要基地过多集中在少数大城市或地区，许多有丰富经济发展条件或资源的地区，由于上述各种原因，没有能够成为国家工业化布局的目标，很少得到国家的工业化投资，几乎没有建立起与全国相适应的工业体系或现代工业经济基础。对于那些处于沿海地区的高度军事敏感地区更是如此。而其中的许多地区本来具有较

好的发展现代经济的条件。第四，这样的初步工业化是在一种中国特有的制度基础上实现的，即严格的城乡分割体制。现代工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而且就全国范围来看，现代工业经济的联系主要是依赖中央计划指令，每一个作为现代工业发展中心的城市，与其周围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基本上没有形成内在的经济联系。大量可用于经济发展的其他资源，例如信息、交通、市场等被人为分割开来，大量资源因这种分割而闲置或浪费。工业中心周围的地区因体制的分割并没有得到相应发展。

中国工业化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揭示了这样一种情景，即中国的现代工业化至本世纪 70 年代末还远远未完成。在现代中国，工业发展乃至整个经济发展还存在巨大的空间。问题仅仅在于，这种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和潜在空间，在很长时期被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所束缚，1979 年之前每一次对体制的调整，都因没有跳出这个体制而告失败。

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正如人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曾经在当代中国的工业化和整个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在这个体制建立之前，传统中国的长期停滞，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迟缓，人民的贫穷落后和外国列强的欺凌，都使得中国社会的生存面临巨大挑战。社会结构各个组成部分、特别是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人民同自私、软弱与无能的政府之间，以及传统社会结构与现代社会结构之间日益积累起来的尖锐矛盾，使得原有的社会结构体系处于崩溃边缘。重建社会秩序、推动现代化的发展，或者说，解决近代中国社会逐渐形成的混乱的总体性危机、加速工业化的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孙立平等，1994）。因此，中国社会的变革不可避免。1949 年中国社会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是近代中国历史演变的逻辑结果。通过建立高度一体化的、中央集权的经济和社会体制，新的国家将几乎全部重要的社会资源集中到自己手中，根据国家工业化的目

标和价值观，直接动员、组织和分配各种社会资源，从而在一个时期内推动了国家工业化的迅速发展。

但是，随着初步工业化的实现和各种新因素的出现或作用，这一体制对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推动能力遇到了一系列困难，这些因素主要是：第一，当一个新的、工业化的经济体系基本形成、且具有了一定规模后，国家对发展的严格控制和简单资本投入的推动作用开始逐渐减小，此时，发展的动力将越来越多地转向体系本身的运作和行为主体的内在动力。如果这两个方面的动力源泉受到限制，发展就将减缓。第二，国家推动工业化或经济发展的能力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逐渐降低，由于这种体制下发展主要是依赖资源投入，在资源短缺或内在积累有限的约束下，国家将很难持续满足投入和需求的增长，从而延缓工业化的发展。第三，工业化或经济发展的机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发生极大变化，技术进步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仍然有可依赖的资源投入，但以这种方式所造成的发展效果远远低于依赖技术进步的效果。第四，由于“迟发展效果”的影响，国家严格控制和主要依赖国家推动的发展机制，会越来越多地受到各种社会需求增长的压力，从而更加减低国家在工业化上的投入能力，影响经济持续发展。

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在经历了巨大成就之后，在面临保持未来持续发展的巨大挑战下，体制的自我改革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和潮流。在中国，这种体制改革的实质被描述得非常简单也非常明确，即：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在全社会“振奋起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精神”，“发展生产力”是检验改革的最主要标准。^①也就是说，改变原有推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基

^①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版，10～11、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本方式，调动每一个社会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中国工业化和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一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即是通过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创造相对自由的流动资源和活动空间，以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在下个世纪中叶加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

在一定意义上，继续工业化和制度转型两个背景因素是互为因果的。制度转型本质上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工业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发生了日益尖锐的矛盾，原有体制已逐渐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这主要是提供推动力的能力越来越低，而整个社会的发展活力受到严重压抑，体制改革成为必然。作为体制改革的基本结果之一，即是非国有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的发展。^①同时，如果我们从现实过程看，体制改革是中国新的工业化高潮或经济发展高潮的直接动因。当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已逐渐丧失动力、内在矛盾日趋尖锐时，没有体制改革就没有这种状况的开始改变，本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一个周期都随着经济体制和其他制度的变革而变化。

继续工业化和体制转型，构成了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在中国重新出现和发展的特定双重背景。对于某些国家或地区来说，其企业家群体的发展是在没有发生体制根本转型的情况下，随着工业化的逐渐发展而形成的，企业家的资本在逐渐扩大的市场中积累起来，例如东亚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或地区。而对于另一些国家或地区来说，真正的“企业家群体”的形成是伴随着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而形成的，但工业化的进程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已经基本完成，新生企业家群体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原再分配

^① 另一个体制改革的主要结果或方式，是指在国有经济内部实行下放经营自主权。这即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形式。

经济制度中转移过来的^①，如原东欧的一些国家。但是，对于本世纪 80 年代在中国开始的社会转型来说，新的工业化高潮和体制改革几乎同时启动。体制改革首先启动了摆脱国家直接控制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创造了新的社会流动和积累财富的体制空间，从而使私营经济部门的发展具有了制度上的合法性和体制上的可能性。随着整个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私营企业发展的体制空间也随之相应扩大；而伴随体制改革出现的新的经济建设和工业化高潮，则为私营经济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隐藏在原有体制中的潜在经济发展空间在摆脱了体制的限制后，成为私营经济部门现实的经济增长点，即使是在国有经济部门占有统治地位的行业如制造业，当国家强制性的压制放松之后，其社会需求也是国有经济部门无法满足的。正是在这种双重推动下，非国有经济部门首先在原中央计划统制经济体制的边缘或外部发展起来，它是市场机会和社会体制双重变革所形成的社会财富积累的结果。因此，当我们从某个新的社会群体产生和发展的角度去分析社会结构变迁的机制时，特别是分析私营企业主的产生和发展时，上述两种社会转型对其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是这两个转型维度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对于其他国家或社会来说，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作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真正新生的社会群体，它们的产生和发展将集中体现出这种特定转型过程的丰富特点。

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私营企业的发展，就可以看到这种体制障碍—发展需求—制度转型的多重作用。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家关于城市个体经济政策的调整开始，从最初的

^① 例如，据汉吉斯估计，在匈牙利有近 20 亿福林的原国有资产被转移到私营企业中。见：Jozsef Bayer/Rainer Deppe（主编）：“Der Schock der Freiheit, Ungarn auf dem Weg in die Demokratie”，Frankfurt am Main, 1993。

专业户、个体户等一系列新的社会身份类型，到实际上几乎同时发展起来的所谓“雇工大户”、“雇工企业”等最初形式的私营企业，私营经济部门在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发展。这种高速度是任何单一因素的解释都无法给予说明的。没有制度性的改革，当然就没有私营企业的发展，而私营企业的发展又常常超出制度结构的限制而保持蓬勃的增长趋势。我们看到，政策的变化有可能抑制私营企业的发展，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在很多情况下也没有对私营企业的发展产生像国有企业那样的结果。体制变革和经济发展相互交错在一起。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讨论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在中国的重新出现和发展时，必须对上述双重背景给予高度重视，将分析纳入这两个背景之下。这势必要涉及远比其他国家更为复杂的相关因素。私营经济既是体制改革的产物，同时又是新的工业化高潮的产物。我们在后面的具体分析中，特别是当分析私营企业或私营企业主发展（成功）的因素时，将大量涉及这两个背景因素，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一些分析假设的基础。我们试图努力将这种分析引向深入，即可能的话，将努力分析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结构基础上，这两类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它们对私营企业的发展各有什么样的具体作用，哪些因素是更重要的。

二、私营企业主群体的结构性要素

构成我们研究的理论背景之一，是社会学中关于社会分层、社会地位的研究，特别是韦伯（Max Weber）关于多元社会分层和布丢（Pierre Bourdieu）关于“资本”的概念。

一个新社会群体的出现和发展，意味着社会结构状况和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如果我们将社会结构理解为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群体之间模式化的关系，那么社会结构的基础即是社会

资源按照一定的规则在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分布，社会结构可以被理解为不同社会集团在占有不同社会资源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按照这样的理解，社会结构的变革是指占有资源的规则发生了变化，因而导致社会资源在社会中的重新分配，一方面新的资源占有集团产生和发展起来，另一方面不同社会集团占有资源的状况也随之发生变化，不同社会集团和社会群体之间形成新的关系模式，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

社会资源可以被定义为由社会主体所控制的、从中可获得利益的事物，包括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两大类（科尔曼，1990）。对于社会成员所占有的、决定其社会地位的社会资源，研究者们从多种角度进行过讨论。韦伯曾分析了“财富”、“等级”和“党派”在决定社会地位差别和社会分层中的作用，三个决定社会地位的概念基本上可归结为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权力地位。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等级”地位。在韦伯那里，“等级”的德文原文是“Stände”，它与后来被人们所广泛使用的“声望”概念其实有所区别。这种等级与经济方面的“阶级”不同，主要指某种特定的社会团体，这种特定的社会团体与特定的生活方式相联系，团体成员具有共同的行为与文化特征，它的形成以某种社会“承认”或“认可”的评价为条件。这样的“等级”在社会生活中往往表现为一些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人构成的“圈子”（韦伯，1964）^①。法国社会学家布丢等则重新讨论了“资本”的概念，将不同的资本形式与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再生产联系起来，富有启发性地讨论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在决定社会地位和社会结构再生产中的意义，使得“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概念和相互转换关

① Max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riss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 Studienausgabe, Köln-Berlin: Kiepenheuer & Witsch, 1964（第一版 1922 年）。